

A29

山西文史资料

第 59 辑

(1988 年第 5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顾问	王西	姚莫中	郝树侯
主任	李蓼源		
副主任	乔志强	李裕民	张友
	姚文锦	韩秋云	
委员	刘子威	赵修身	尹世明
	贺德宏	李俊虎	罗广德
	马明	杨小池	张海瀛
	张豪若	刘纬毅	范仁贵
	曹秋恒	霍成勋	孙凤翔
	刘海清	叶昌纲	张正明
	史法根	翟品三	杨玉印
	刘存善	赵政民	霍军

主 编 李蓼源

副主编 霍 军

目 录

民族革命大学建校概述.....	杜任之 (1)
民大见闻录.....	秦丰川 (6)
李公朴与民大.....	杜任之 (12)
我在民大的两年.....	武创辰 (15)
民大工作回忆片断.....	庄启东 (27)
杜心源在民大.....	博 民 (32)
杜心源事略.....	赵冬生 (35)
从民大到抗大.....	简 丰 (39)
参加民大学习亲历记.....	路纪宇 (51)
民大二期学习漫记.....	刘 沧 (55)
我在民大学习的经历.....	方北雁 (61)
在民大三分校的学习战斗生活.....	夏 风 (67)
抗大式的干部学校——民大四分校	郑 东 (76)
民大五龙宫起义纪实.....	薛博民 (86)

阎锡山与民族革命大学	徐崇寿 (112)
太行根据地的音乐运动	洪 飞 (120)
一·二六事件始末	胡志涛 丁 丁 (131)
革命诗人刘秀峰	刘小云 (156)
蒲剧著名演员阎逢春	行乐贤 (166)
张贯三先生二三事	高之杜 (181)
三晋名士常赞春	吴连城 (184)
回忆李亮工先生	宋为霖 (188)
刘克笃与山西大学	刘国朴 (192)
杜威在山西大学讲演	薛 愈 (195)
阎锡山会晤孟禄博士	石 生 (200)

民族革命大学建校概述

杜任之

我是1927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留学德国后，回到山西做策应抗日的工作。抗战初期，太原失陷之后，我们辗转来到运城。这时我接到阎锡山的电报，让我到临汾见他。我于1937年12月上旬来到阎锡山驻地，他对我说：“你有过一段在大学里教书的历史，在太原还办过‘暑期健身团’，又是二战区的上校参事。现在办起一个‘民族革命青年学校’，你就给咱当教务长吧。教员由你请，学生由政治处、军训处管理。我给你们当校长，让梁化之当办公室主任。”

我想，这个学校在抗日高潮中诞生，可以培养抗日青年干部，有利于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知识阶层抗日，便接受了教务主任的任命，同时说：“民族革命青年学校，这校名不响亮，缺乏号召力，最好改为民族革命大学。”

阎锡山听了很高兴，就把校名改了。

民族革命大学设有四个处：教务处由我任主任，主管编印讲义，请教员，安排课程等事宜；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军训处主任郎某；总务处主任裴济明。在建校同时，阎锡山已派梁缙武到西安、武汉两地去办理招生事宜并招聘教师。学校更名之后，还打电报通知了梁缙武。

1938年1月，临汾已成抗战前线，“民大”又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不少学者、名人和许多学生慕名而来。从年龄看，小的

十三四岁，大的也只有二十五六岁。其中有初中生，也有大学肄业或毕业生。特点是：大家都有一颗火热的抗战的心；年龄差异大，文化程度高低不一。粗略估计，大约有3000学生。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学者，象江隆基、侯外庐、温健公、何思敬、施复亮、陈唯实、秦丰川、周巍峙、徐懋庸、刘肃然、李公朴、肖军、肖红等先后来到“民大”。

每来一批学生或一两位学者，我都立即给他们安排作报告或讲演。战时环境虽很艰苦，但能聆听到著名教授讲课，学生们很快就安定下来。

在聘请教员的工作中，李公朴是出了力的。据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等人说，他们都是李先生介绍来的。为了感谢李先生的支持，我们特意去函邀请李先生前来“民大”授课。李先生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来到临汾，被阎锡山聘为“民大”顾问和教授。我还与他一起，参照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拟了一份《民族革命大学纲领》。把党的“全国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结，实行抗战教育”等基本思想都写进去了。此外还强调了抗战和军事训练、民运宣传、学生自治和自觉纪律等条。我征得公朴先生的同意，对这个纲领作了逐条阐述，写成文章，发表在《民大校刊》第一期上。

“民大”坚持正确方针，学生不久便增至5000人。除本校外，又设立了三个分校。第一分校在临汾，第二、第三分校在运城。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都在《民大纲领》的号召下团结统一起来。公朴先生来校不久，先后作了几次报告，他每天坚持同学生、教员一起跑步、爬坡，有时还参加军训、打靶。

“民大”的课程绝大部分是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包括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民族革命理论和政治时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经济学》是必备的参考读物。在课

程安排上曾引起不少周折。阎锡山对“民大”讲什么课很关心，他亲自过问，硬要把他的“学说”安排上。我推诿说：“人家都是来抗战的，‘老总’的‘学说’与抗日终究关系不大。”

阎锡山却说：“不要书呆子气。现在来抗战，将来还不要各干各的！我们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共产党！”

我只好应付说：“‘老总’的‘学说’可以印成小册子，在学生中散发。如果去讲，‘老总’这样忙，怕没有时间去吧。”

于是，政治部、宣传部发出了阎锡山的《按劳分配与物产证券》的小册子，副题是《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触怒了进步同学，他们互相串连，立刻有二百多学生跑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随营学校彭雪枫那里去了。为了此事，我去见阎锡山说：“学生们喜欢听抗战的课，一发那小册子，有些人就走了。”他一听人们抵制他的“学说”，也不再硬性安排讲他的课了。

我又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了解情况。这些学生表示再也不回“民大”，再也不去接受反动教育。彭雪枫劝他们说：“‘民大’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可以有各种教材，大家还是回去上课。现在我们在这里没有政权，没有给养，大家都来会有困难。还是回去，去吃他们的饭，学习抗日的本领。”经过劝说，多数人又回到“民大”，也有少数同学坚决留在办事处随营学校。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大举进攻临汾。“民大”向吕梁山腹地撤退。3月间，日军又进攻乡宁、吉县，“民大”师生又继续向黄河西岸撤退。“民大”师生的撤退队伍，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疯狂扫射。有两个学生被炸死，大家忙于赶路，连他们的尸体也未来得及掩埋。有一位教师后来写诗描述当时的情景：

日寇的铁鸟啄食了两个青年的魂灵，

他们的肉体也只好等待鸟兽吞噬。

啊，在这黄尘滚滚的大路上，

我们诅咒日寇对我们的侵袭。

“民大”师生走了200里路，来到乡宁。在此又遇到三分校的师生们。为了行军方便，把民大三分校改为支校，由我带领继续前进。几千人的大队来到黄河岸边，加上阎锡山总部，在黄河渡口小船窝前足有5000人要渡过河去。渡船少，人多，阎锡山下令让女生和病人留下，等候渡河，其余一律沿河北上，另找渡口。沿河北上，行至壶口，看到两岸相距不远，大家都想在此渡河。有一位横渡过长江的游泳能手苍振东，想用绳索引渡大家，他自告奋勇去拴绳子，不幸牺牲。

沿黄河北行，走了一天，来到平渡关，我们看到对岸红旗猎猎，原来是八路军在那里驻有一个连。他们派来两只渡船，大约用了4个小时，就把1500多人全部渡过河去。

夜色中，同学们已全部渡完，大家围住我询问：“‘民大’到底往那里去？”

我向大家讲明：“我们奉命到南边的宜川县。到宜川有一天的路程，从这里到延安，有两天的路程。南下是宜川；北上，是延安。”

大家没有吃的，要我想办法。我说：“现在困难很多，要饿肚子抗日。受不了艰苦的，可以去西安；愿意走的可以到延安；留下的，我带你们到宜川。”

大家到附近村子里去找吃的去了。第二天集合已不到千人。约有四五百人到了延安。我们回到宜川，见了阎锡山，他说：“走就走了吧！现在正困难着哩，没吃没喝，剩下的既然不足千人，可以分为两个系，一个军事系，一个政治系。”他安排杜心源兼任军事系主任，由我兼任政治系主任，病号陈唯实任副主任，彭平（裴昆山）为政治系办公室主任干事，王子野任政治工作处干事。后因彭平在李昌的领导下，联系和发展“民先”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被梁化之发觉，解除了他的职务，在准备逮捕他时，我资助路费掩护他去了延安。

6月，“民大”第一期学生毕业，由二战区政治部分配工作，大部分学生到“牺盟会”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分配后，“民大”校部迁到黄河东岸吉县南村。阎锡山为培养自己的亲信，挑选了一百多名学生，称为“民大”随营分校，随他到黄河东岸吉县文城。

随着环境的好转，阎锡山开始了对“民大”的“整顿”。他把教务处合并到政治处，让杜心源兼办公室副主任，我任编委会主任。经过这次“整顿”，先后有一百多人离开“民大”。至于我担任的编委会主任，实际是个清闲职务。除编印《校刊》外，我还利用时机编写了《“民大”丛书》，其中包括宣传、组织、武装、国际问题、人物志等类别，共出版了6册。第二期开学后，我边讲边编，写成《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这本书是参照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以及苏联的战争理论写成的。由当时的“民族出版社”出版。

“民大”还吸收了一些国际朋友，共同抗日。我曾推荐朝鲜同志朴建雄、尹澄宇、崔英为“民大”干部和教师，以后，他们先后到了延安。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来到二战区与阎锡山会谈。我乘此机会，去会见了朱总司令、肖劲光和王世英等同志，听取了他们的讲话和指示。他们对“民大”的工作是肯定的，赞扬了牺盟会和新军，鼓励大家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这对“民大”的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使“民大”这个特殊的培养抗战人才的学校，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对抗日战争和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

（郭春涛 整理）

民大见闻录

秦丰川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我于当年冬天由德国回国，于1938年年初至1939年8月，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担任教授。

抗战开始不久，太原和大半个山西便被日军侵占，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阎锡山退到了临汾。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纷纷溃退，八路军却挺进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争；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使得国民党想投降也不敢公开投降。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打起“民族革命”的旗子，维持抗战的局面。为了进行抗战，就得培养一批新的干部。这是阎锡山大肆宣传成立“民大”的一个目的。

另一方面，抗战一开始，全国进步的青年便冒着被蒋介石特务扣留的危险，奔赴延安，参加“抗大”学习。阎锡山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是对自己很大的威胁，于是就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成立“民大”，骗取那些爱国青年到山西，阻止他们到延安。这是阎锡山成立“民大”的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民大”成立到1939年秋天我离开以前，是有过几次动荡和变化的。它的演变的趋势是：规模越变越小，程度越变越低，性质越变越反动。动荡和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临汾阶段。这是“民大”的创办阶段，也是“民大”的“黄金时代”。从1937年冬天开始成立，到1938年春天阎锡山退出临汾，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内，“民大”就在临汾成立了本校、一分校和在运城、曲沃成立了二、三分校和四分校。学生人数达四五千人，其中很多是进步青年。

“民大”在刚创办的时候，曾在武汉和西安都设立招生办事处，除大量招收学生外，还聘请了不少当时的知名人士担任教授。这些人到了“民大”之后，可以自由讲课，全校的政治空气显得很活跃。这时的“民大”确实有统一战线的性质。

这一阶段的突出表现，是在1938年2月间发生了学生斗争托派汉奸张慕陶事件。这个革命的行动，不仅震动“民大”，而且轰动了全国。

第二是宜川阶段。这是“民大”的大动荡阶段，也是“民大”的分化阶段。1938年的2月间，日军进攻临汾，阎锡山向西撤退，“民大”跟着行军。到了吉县所属的小船窝，阎锡山和他的一部分随从人员过了黄河，“民大”因为缺少渡船没有过去。就在黄河边上呆了一天一夜，情况很是混乱。有的学生组织起来，准备打游击；有的学生自动离队，不知去向；大部分学生被一个叫做谭松霆的临时编成“民大游击纵队”（他是传达副校长杨爱源的“命令”这样搞的），带着学生顺着黄河向北移动。

到了马斗关，“民大”学生甩开谭松霆，过了黄河，进入边区。经过和阎锡山联系，指定“民大”住到宜川。这时，经过行军中的动荡，三分校和本校合并了，以后一分校也和本校合并了。原来三分校的学生，由三千来人减少到不够二千人。其中有不少进步青年是在过了黄河之后到延安去的。

“民大”在宜川住了大约有两个月，阎锡山集团内部形成一种对“民大”进行分割的局面。最突出的事实是经阎锡山批准，由薄右丞在原来的本校挑选了三四百名“优秀学生”，成立

了“随营分校”。其目的，是为了把这一部分学生放在阎锡山的直接控制下，防止他们投奔延安，培养他们成为阎的工具。

这一阶段的“民大”，绝大部分的知名教授走了，很多的进步学生也走了，课程的内容也变了，革命的气氛也差了。这已经清楚地表明，这时的“民大”已经开始改变了它的统一战线的性质。

第三是南村阶段。这是“民大”的“调整”阶段，也是“民大”的衰退阶段。大约是在1938年的夏末秋初，“民大”由陕西的宜川，回到吉县的南村。那时阎锡山和他的总部，已经先“民大”回到山西，住在离“民大”七八里地的古贤村。直到1938年的12月间，这种情况没有变化。这就给了阎锡山一个机会，对“民大”进行一番“调整”。

“调整”的主要表现是：一、把临汾时期招来的本校学生，当做第一期分配了工作，又从西安招来了一个“大高第四队”，算是第二期的开始；二、把原来的一分校和三分校的学生重新编了队，成为本校的基础，另外单独保留二分校，住在离南村20多里远的刘村；三、课程方面增加了阎锡山反动学说课。调整以后的“民大”，只有三个大队（也许还有四个，记不得了），规模比在宜川时期又有所缩小。最后留下的一个外来教授陈唯实也走了。

第四是川庄（记得是在大宁县沟内）阶段。这是“民大”的质变阶段，也就是“民大”开始变成一个普通训练班的阶段。1938年12月间，日军又向吉县一带进攻，“民大”便由南村向北移动。到了1939年的初春，住到大宁县属的川庄。

“民大”在川庄又起了显著的变化，从此它完全失掉了创办初期的革命朝气，成了阎锡山的一个普通训练班。其主要的变化是：一、调走了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教务处主任杜任之和政治处主任杜心源；二、派来了几个反动的旧军人，担任军事教育；三、

规定了少数几门课程，限制了教官自由讲课，进一步增加了阎锡山反动学说的比重。

“民大”的这种质变，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和阎锡山准备公开反共的部署分不开的。以后的事实证明，阎锡山准备公开反共的“秋林会议”就是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在“秋林会议”之后，阎锡山的一系列的反共措施都露出头来，“民大”的性质当然也就随之变得更缺乏革命精神了。

“民大”的组织情况，总的说来，“民大”是采取军事编制，实行军事管理的。随着四个阶段的不同，学校的行政机构，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学生的组织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全校分9个大队；大队之下设中队；中队之下设分队。从大队到分队，每个队都有军事队长和政治工作人员。“民大”的校长，是由阎锡山自己兼的，副校长民主人士李公朴，这完全是为了吸引青年摆的幌子，李公朴从“民大”退出临汾之后，只到过一次宜川，和学生匆匆见了一面，便从此告别了。听说另一个副校长是山西的旧军人杨爱源，这越发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陪衬，我来“民大”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没有见他露过一次面。“民大”的实际领导人，是校长办公厅主任梁化之，他虽然不经常到校，但是他通过由他配备的军政干部（绝大部分是牺盟会的会员），可以把学校从上到下地领导起来。

“民大”在校长办公厅梁化之的直接领导下，设有军训、政治、教务、总务四个处。军训处领导军事干部，主管对学生的军事管理和军事教育；政治处领导政治干部，主管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教务处主管和教授联系以及课程安排；总务处主管会计、事务、运输、医疗等。

校长办公厅设有一个秘书，负责全校的行政事务，秘书是李济生。军训处主任郎盛德（也叫郎贯一），在南村阶段离开“民大”到重庆担任了河北省政府（主席是于学忠）驻渝办事处的主

任。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在川庄阶段离开“民大”。教务处主任杜任之，记不清楚是不是未到川庄之前，还是到了川庄之后离开“民大”的。总务处主任裴济明（也叫裴琛），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离开“民大”的，1939年阎锡山在秋林成立的“精神建设委员会”，他是负责人。

“民大”的组织机构，在宜川阶段曾经有过一些变化。除过另外成立了一个“随营分校”之外，在本校我记得也挑选了一部分有专长的学生，成立了三个队，一个是艺术队，由杜任之担任队长；一个是军事队，记不清楚是由谁担任队长；一个是政治队，由我担任队长。此外，还在政治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政治指导室，由我兼主任。梁化之的这种分割式的安排，显然是为了使这些人互相牵制。这种组织形式，回到南村之后，便取消了。

“民大”的教学内容，从形式看，“民大”自从成立之日开始，教学内容就有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政治课、军事课和阎锡山的理论课。但是由于阶段的不同，这三种课程所处的地位大有区别。在临汾阶段，是政治课挂帅，军事课配合，阎锡山的理论课没有人愿意听。在以后的三个阶段里，政治课所处的地位逐渐降低，军事课的比重逐渐增加，“理论课”的内容一天比一天反动。

担任“理论课”讲授的人，都是跟阎锡山多年的高级干部或是“理论家”。如李冠洋、邱仰浚、薄右丞、周新民都曾讲过阎锡山的理论。在南村阶段，杜任之还讲过“按劳分配”和“物产证券”。担任军事课讲授的人，前一阶段是军事处的干部，后一阶段专门派了几个反动军官。担任政治课讲授的人，绝大部分是由外地请来的教授。这些人在“民大”的不同处境，反映着“民大”的性质改变。

在临汾时期，政治课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记得有这样一些人担任这样一些课程：何思敬和施复亮讲政治经济学；陈唯实讲

唯物辩证法；侯外庐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江隆基讲苏联研究；刘达人讲中国外交史；秦丰川讲国际问题。还有徐懋庸、孙荪荃、肖军……我忘了他们担任什么课程。总之，在这个时期里，阎锡山为了骗取青年到“民大”，对于这些外来的人是很重视的，“民大”这时可以说是革命的。

可是从“民大”决定撤出临汾的那一天开始，这些人的处境就起了变化。等到宜川的时候，除陈唯实以外，其余的人都走了。他们的走，与其说是自己愿意离开，不如说是阎锡山有意把他们逼走的。这里有三件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在将要撤出临汾的时候，发给聘书，分教授、副教授、讲师三等，有的人对聘书不满意，就从临汾走了。二、在撤退出发之前，总务处向大家宣布，教授们徒步走，行李后边有车拉，可是到了吉县，才知道东西都丢了。有的人对学校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很气愤，自己过黄河走了。三、短期住在吉县城里的时候，教授们为了办好“民大”，提出学校行政、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三结合，共同治校的要求，但阎锡山没答应，于是有的人又走了。这就是说，“民大”还没有过黄河，外来的教授已经走完了。

过了黄河之后，有不少进步的学生也走了。阎锡山看出没有一些外来的教授作号召，以后“民大”的局面是不好维持的，于是在宜川、南村又请来几个人。但是从此一律改称教官，降低了这些人的地位，也降低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我记得“民大”后期的政治教官有：蒲子政、刘潇然、原政庭、李文润、叶笠、秦淮、陈凤章、朴进勋、尹澄宇、崔英（后边这三个人是朝鲜人，至临汾时期他们就到了“民大”）等。他们担任的课程，除记得蒲子政讲政治经济学、陈凤章讲日本侵略中国史外，其余都记不得了。据我事后所知，这些政治教官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都相继离开了“民大”。从此“民大”便成了一个由阎锡山完全控制教学内容的训练班。

（作者现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宿舍小楼42号院）

李公朴与民大

杜任之

1937年冬太原沦陷后，领导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山西临汾成为抗日前线。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进步、革命力量的促进下，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民族革命大学”。我担任“民大”教务处主任。学校派人到武汉、西安等大城市招收学生，聘请教员。学生、教员源源来校报到。教员中的何思敬、施复亮、陈唯实等说是李公朴介绍来校的，并且由他号召大批学生前来“民大”。因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衷心感激公朴。

 隆冬严寒，大雪纷飞。李公朴同他的夫人张曼筠从武汉北上来到抗日前线的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所在地。事先，为了欢迎这位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民主抗日战士，我向民大的教职员生宣布了他即将到校的消息。与李公朴有关系的和受过他影响的教员、学生立刻就书写标语张贴大街墙壁上：“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前线来！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大来！”有的标语还写着“热烈欢迎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公朴一到临汾，兼民大校长的阎锡山要我立即陪同接见李公朴夫妇。我向阎兼校长介绍了李公朴对民大高度热心支持的情况，阎当面就请李公朴担任民大教授和顾问，并请他提出如何办好战时民大的办法。当天晚上我即和李公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草拟了一个

《民族革命大学纲领》，把党的“实行全国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结；实行抗战教育”等等基本思想都写进去了。此外，还强调了抗战政治和军事训练、民运宣传、学生自治和自觉纪律等条。这个纲领对民大培训学生坚决走向抗日，坚持团结进步，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我对这个纲领逐条作了详细解释，公朴也完全同意，后来刊于《民大校刊》第一期上。

1937年冬，山西临汾处于抗日的最前线。怀着抗战热情而从平、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和教员总数达5000余人，其中有大学生、中、小学教员和中学生。因此，民大除本校外，还设立了三个分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包括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都在民大纲领号召下统一起来了，李公朴除在本校做报告外，还在一分校和设立在运城第二、第三分校去做报告。他爱民救国的精神，坚决抗日的意志和奔放的革命热情，加上他善于讲演，动听的言词深深地感动了学生。北风凛冽，寒气逼人，公朴无论在临汾本校、一分校，还是在运城民大二分校、三分校期间，都曾同大部分学生、教员每天早上练习跑步、爬坡，有时并参加军训、打靶，锻炼持久抗战的作战本领。一天早上跑步完毕，我对他说：“你头上冒着热气。”他笑着说：“我们是要把学校搞得热气腾腾的。”我说：“我们也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旁的一群学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大举进攻临汾。民大向吕梁山地区进发。当时公朴在运城，由于形势紧迫，协同少数学生渡过黄河到西安。3月间，日军进攻吕梁山地区乡宁、吉县等县城，民大学生当时还没有武装起来。由于日军逼近黄河边，民大师生从平渡渡黄河。几位教员和大批学生北上往延安学习去了，其余学生南下到宜川集中待命。一部分学生由宜川一直跑到西安去了。由于经历了战争炮火冲击和长途行军，民大在宜川既没有必需的设备，又缺应有的教员，学生每天虽然高声唱着校歌：“我们